

明日文学丛书

曹正文 主编

一

世纪传真

管志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纪传真



贵阳市图书馆



0467119

125
1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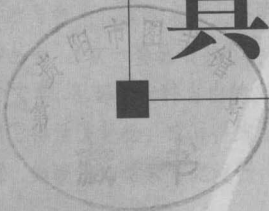
明日文学丛书

明日工作室集团(上海)策划

世纪传真

管志华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纪传真 / 管志华著.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ISBN 7-80618-976-9

I. 世 ... II. 管 ...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818 号

世纪传真

作 者: 管志华

责任编辑: 卫 丽

封面设计: 黄莉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普教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 1-3 200

ISBN 7-80618-976-9 / I · 218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温世仁

中国是散文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可以读到不少优秀的散文，如《左传》中的《烛之武退秦师》，《国语》中的《召公谏厉王弭谤》，《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老、孔、庄、孟、墨、荀诸子百家的小品，都精彩而隽永。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也是散文家辈出，李斯、司马迁、东方朔、曹氏父子、诸葛亮、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羲之、江淹、郦道元等，各具风格。晚唐小品与宋元小品又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鹤立鸡群，傲视文坛，而梅尧臣、范仲淹、周敦颐、沈括、陶宗仪也成绩斐然。明清两代，是中国散文小品的鼎峰时期，宋濂、刘基、归有光、三袁、张岱、方苞、袁枚、赵翼、龚自珍诸家群星丽天。而现代文学阵地上，胡适身体力行提倡了白话文，经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诸位大家共同努力，使中国的白话散文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由于人们喜欢写散文、读散文，上海明日工作室策划了这套“明日文学丛书”，这一套丛书共6册，除散文小品外，还有通讯与报告文学，但都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或状物抒情，或叙事写意，或写得活泼轻松，或写得绚丽多彩。如翁长松读史札记之深意，如凌进如话家常之流畅，如蒋坤元水乡人

家的质朴，如管志华大气磅礴的写实，如胡申生、王国荣新颖独到之议论……都令人读之欣喜。这些大学教授、报社记者、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和企业领导人，都以自己的真诚与对文学的专注，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明日工作室将培养出一批新的文学家，由曹正文先生主编的这套“明日文学丛书”将为更多的文学新人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

（本文作者系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畅销书作家）

目 录

序 言 ····· 温世仁

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 ·····	1
为 21 世纪献一份厚礼 ·····	11
中国，呼唤明天的教育 ·····	17
未来人才的摇篮 ·····	29
文化经纪人 ·····	39
上海导游 ·····	50
大都市的特色旅游 ·····	59
“土地神”不再沉默 ·····	65
“隐性”失业者 ·····	70
钱江泪——萧山观潮大惨祸 ·····	80
经济记者的脚步 ·····	86
“空中传媒”新军 ·····	95
上海“大众”，你好！ ·····	103
一把闪光的金钥匙 ·····	118
探寻“绿色王国” ·····	131
没有时间的备忘录 ·····	138
朝阳，从东方升起 ·····	153
东方美神——“兰贵人” ·····	168
“大气王国”的警钟 ·····	180

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

历史的叙说

一本历时18个春秋、凝聚着1000余位学者、专家和语言工作者的心血的巨型辞书《汉语大词典》问世了。

《汉语大词典》的诞生，意味着在汉语发源地的中国，对词语的发展演变终于有了全面、科学、历史的基本总结。正如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的：“出版发行《汉语大词典》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国知识界纷称这是项“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成为辞书界一座新的里程碑”；海外知识界也予以极大关注，称赞《汉语大词典》是“中国辞书史上的典范”，“耸起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将它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之一。

中国是个有编辞典传统的国家。从我国第一部辞典《尔雅》算起，像《方言》、《说文解字》、《广韵》、《集韵》、《康熙字典》等，2000多年来所出的各种韵书、类书、字书不少，但这些都是拿一个字一个字作单位，却没有一部比较完备、贯通古今的汉语大词典。

这里，我们再须提及汉字文化圈所发生两次大规模的语词流动浪潮：即第一次由中国流向日本等国家；第二次由日本流向中国。借助这两次浪潮，日本在20世纪初趁时率先编纂了一部收汉字5万多个、收词条50多万条的《大汉和词典》，前后花了40余年。

当然，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有过想编一部大词典的夙愿。1930年前后，语言学者黎锦熙等就筹备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可内忧外患，时乖运蹇，他们编纂大词典的祈愿化为泡影。老一代人的夙愿，诚当执著不懈，却难逃“国运衰、辞书败”的规律。大型词典的编纂，除有赖于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更有赖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历史正这样地告诫。

社会发展之镜

词典，人称“传世之珍”。同时，更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到一定强盛阶段，都要着手整理本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字，编写大型语文词典，使民族和国家的机能发挥得更趋完善。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就着手并完成这项工作。如《牛津英语大词典》，从1858年收集资料，1879年开始编写，到1928年10卷出齐，整个编纂过程历时70年；《德语词典》（16卷）用了近100年；俄罗斯《大科学院词典》花了50年。相比之下，我国《汉语大词典》有些姗姗来迟，但现在毕竟完璧面世了。花18个年头走完人家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路，实属不易。《汉语大词典》共收词语37.5万条，约5000万字、2253幅插图，其规模巨大，质量上佳，能与国际上同类词典相媲美。

1994年三四月，我来到上海华东医院采访因病住院的著名语言学家、《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他不无感慨地说：“编这部词典，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个机遇，18年来可谓有难同当，同舟共济，没有党中央的领导与关怀，没有华东五省一市的共同协作，没有老中青三代人的齐心努力，大词典很可能半途夭折。”

1994年2月中旬，在北京采访著名语言学学者、《汉语大词典》首席学术顾问吕叔湘时，这位90高龄的老人同样深有感触：

“这项工程浩大，不容易。”“编纂中尽管走了些弯路，这么大规模难免还可挑些毛病，但总体要比日本《大汉和词典》、台湾《中文大辞典》的质量要高，这是今后大家都会肯定的。”

《汉语大词典》工委会主任已换三届，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大词典工委会主任刘杲则说：“编大词典的历程用图来表示，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可用‘备尝艰辛’四字概括。”

编纂《汉语大词典》起始于1975年。

这年，邓小平同志复职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给国家带来了转机 and 希望，知识界为之振奋起来。该年夏季，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联合召开“全国词典工作规划会议”，会上制定了编写出版160种词典的十年规划，其中语文词典规模最大的一部是《汉语大词典》。

规划送呈国务院，经邓小平同志审阅后又送给病重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抱病审阅并批准了这个规划，还在报告上写了“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表示歉意”。殊不知，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的最后一个有关出版工作的文件，当人们知道他身患绝症，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仍然关心辞书出版，禁不住潸然泪下。

9月间，国家出版局在上海召集江、浙、鲁、皖、沪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商定《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后福建省也参加）协作编写，上海负责出版；并专门成立了编写小组（后改为工作委员会），由当时国家出版局长代局长陈翰伯任组长。

大词典草创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据现浙江省词办主任蒋金德回忆，1976年他刚到省党校搞词典，看到十几个人挤在办公室，个个埋头书籍文稿，满桌堆满资料卡片，甚至深夜还灯火通明，编辑室仍是一个个低垂脑袋工作的人。他暗自思忖：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天地！该省编“寸字部”时，浙大老教师程二如道出：“编不好词典死不瞑目”，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他们

不去想也想不到什么名和利，有的因劳累而病倒，有的因全身心投入而难顾家庭，像浙师大的张叶芦长期奉调杭州，几乎是饱一顿、饿一顿，但他毫无怨言，发誓要做“大词典的‘死硬派’”！像这样的人还有方福仁、林菁、陆鉴三、洪湛侯等以及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守良，包括众多的工作时限不一的资料员。

1978~1979年间，胡耀邦、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和批示，进一步明确《汉语大词典》代表国家水平，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华东五省一市领导也从人员、场地、经费、职称、生活等各方面给以具体关心和落实。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指示：“汉语大词典是一宏大工程，积累了大量资料，是一大财富，工作继续下去，政策上要支持，工作做好了，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说到这些，大词典编纂人员体验为之十分深刻：没有党和政府支持，个人力量再大也无济于事。

“风雨楼”的故事

1993年，秋日。

在上海新华路200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采访，看到一批中青年骨干正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神情显得那么贯注，几乎忘却外界的喧嚣，徜徉于这片不可侵犯的知识净土，充满着神奇、甜蜜、苦涩的意蕴。

让我们讲一段“风雨楼”的故事：那是1985年春天，山东大学吉常宏、曲阜师院相隆本等奉调来沪参加第一卷定稿工作。说来，他俩有师生之缘，禀性都很耿直，业务上都有“奇才”、“怪才”之称，也许是他们又都有过知识分子遭受磨难的境遇，以致时时被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所驱使，将整个身心交付了大词典。

不过，他们也会抬杠，为编纂中的疑难点争这争那，争得

面红耳赤。这样，有时就很紧张，有时又笑逐颜开，忽而风风雨雨，忽而阳光普照，两个眷恋大词典着魔似的痴汉如孩童一般。

他们住编纂处的铁棚简易楼，夏天酷热，好似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可为了工作，也都顾不得体统，光背赤脚，一边看稿，一边用冷水毛巾擦汗。到了冬天，北风呼啸，屋里冷得出奇，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生活，冻僵手脚时，干脆钻进被窝再看稿，经常是彻夜不眠，熬红双眼。那时，相隆本家里妻病子伤，女儿高考不中，一连串倒霉音讯传来，让他十分内疚。怎么办？关键时刻当以大词典为重！他紧急而妥善处理事宜，硬熬过来。

那些难忘岁月，诚如山东省编纂人员所说：“是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一往情深，不可分离！”——外边世界闹得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他们却悄悄地“躲进小楼成一统”。

“风雨楼”故事，则是大词典编纂中一段极其平常的插曲，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轰轰烈烈，却于细微中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

18年中，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资深学者，还是风华正茂的后起之秀，他们对每个词条都是认认真真地“爬梳钻勘”、“刮垢磨光”，饱尝求源索解之苦，共享去塞求通之乐。他们说得好：“这样的日子过得踏实！”

18年中，老一辈领导、学者、专家也为这部词典贯注心血乃至献出生命。像陈翰伯同志二次中风，最后不幸逝世；又如江苏省原出版局副局长陈立人为词典南北奔波，耗尽心力，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如浙江省原词办主任孙九成因过度劳累，引起脑溢血，猝死于现职岗位。我们可以发现，13卷《汉语大词典》中，先后有几十人辞世，卷前的名册添加了不少黑框，使人黯然伤怀！正是这批可歌可泣、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在生命的晚霞里重燃一把火，以肝胆相照、呕心沥血的红烛精神，发出人生奋斗的绝唱，他们将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18年中，岁月洗净了年轻人的稚气，染白了中年人双鬓，却

始终不改他们的初衷，哪怕外边世界再精彩，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仍固守一份执著的信念，可谓“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采访原编纂处主任、现任香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王涛，他动情地说：“为编大词典，几乎每人满脑子绷紧一根弦，人家认为咱是‘机器人’，这样活着真无意思。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心里有一项非常热爱的事业！”原任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主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阮锦荣，为了做好协调工作，常常“为伊消得人憔悴”，长期劳累下，因病住院割除了一只肾脏；副编审郭忠新为了赶进度，常昼夜不停地审稿，眼睛几近失明；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同志，都为大词典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但给人们永存了一份财富——伟大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恭敬地向他们鞠躬致意，道一声：“同志，谢谢！”

傻子与圣人

1980年11月下旬，在一次《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会议上，著名学者陈原幽默地坦言：“‘傻子’才去编词典。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情，而是圣人干的事情。你钻进去有无穷的趣味，你不钻进去简直是味同嚼蜡。”

陈原先生的话，不由使人想起16世纪另一位意大利语言学者斯卡利兹之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不是局中人，焉知个中味？无怪乎古今中外词典家都有惊人的相似之论。

以《牛津英语词典》首任主编默雷来说，常常是深更半夜地趴在地上核对资料，弄得来看望他的朋友啼笑皆非；他40来岁时主持编写，直到60多岁病逝时，尚未看到他的成果。《大汉和词典》

主编诸桥辙次几乎也是大半生为此操劳，最后导致眼睛失明。类似这样的经历，在大词典编纂人员身上也可找到，他们成为“词典迷”，每日每夜被“字网”套住，掉进词典网里出不来。

福建省编写组在起始收词资料阶段，因书籍匮乏，最后派人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轮番七天七夜，硬是把一本古书抄出；安徽省编写组马君骅老先生，年事已高，连咫尺米粒都看不清，为编汉语大词典，他买上放大镜，并发动老伴一起做，最后他的稿子还自己抄，而且字迹工整、清晰。

采访中，我不时被那些数以百计而至今未留姓名的编写、收词人员的事迹所感动，他们有的夜以继日、披星戴月，颠倒“生物时钟”，以致闹出笑话；有的整天价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过日子，连做梦也看见那些字在“打架”！编纂人员多为教师，说真的，除教书外，他们可写论文什么的，发表了又有名，又可赚几个钱的稿费；若写出一本书，地位上升，身价倍增。可编词典……有位姓王的编纂人员非常理直气壮：“编词典同样有学问！”她讲出一番道理：教学可以一回生、二回熟，编词典不然，天天要跟新课打交道，就要求你是专家，又是杂家，能对上下几千年中的一切人物事物，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举凡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帝王将相、农工兵商、绿林豪杰、青楼歌伎，等等，都要有所了解。

“岂不成‘万事通’么？”她从容地回答：“一个人的知识领域毕竟有限，咋办？啃书呗！”

编词典确是实打实，唯靠勤恳，老实地翻书查书，硬着头皮看，眼看花了，脖子累硬了，仍一无所获，顿时会内心烦躁、局促不安，这些都是词典编纂者共同的心理体验。

江苏省有位年届六旬的黄先生很有意思地说：“一个聪明人看了一本书可写十本书，一个傻子看了十本书也写不出一本书。”此话意在编大词典不是“卖花拳”，而是靠人品人格，靠治学门风。

采访中，可以现场观察到词典编纂人员那种做事认真、工作细致的作风，他们往往推敲一个词、一个字、一笔画、一标点，体现了他们良好的业务素养和职业习惯。比如有条引文：“钮氏树玉段注订徐氏承庆段注，匡谬至勒为专书”，其实钮树玉的《段注订》是一部书，徐承庆的《段注匡谬》又是一部书，一个标点点错，谬之千里，不可卒读。由此，他们几乎每天都为这样防不胜防的失误苦恼，拿他们行话说是“捉虱子”，稍有疏忽，就会白玉存瑕，误人子弟。他们求高标准高质量，以塞缪尔·约翰逊的话自律：“作家都可以指望蜚声扬名，唯独词典编者只能希望不受指责。”

已有70多岁的老编审傅元恺，早年经历坎坷，参加词典编写筹备时已是56岁了，他很感慨自己一生没有做什么事，唯在暮年之际了却个心愿。他从大局出发，一门心思看稿审稿，以致无暇去写个人专著专论。谈到编词典甘苦，他认为根本没有巧妙之法，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查书，增条做加法，浓缩做减法，但必须来一个“本本主义”！有一次，他审阅“三一”条目，花了好多时间仍不知所云，只能阙疑。像这类疑题，他是经常挂在脑子里打上问号。几天后，他从《云笈七签》卷四九查到：“精、神、混三为一也！”再翻有关古籍，顿然开窍，方知是古代思想家术语；后遇上“阿罗呵”一词，又百思不解，再查《山海经》等，终于明白这是唐朝口语，即“罗汉”之意。他深有体味地说：“编大词典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都费功夫’。”

编词典的释义既要正确、精确，又要简约、丰腴，是个不易达到的境界，加上各条书证引书格式的各类问题，有人称作：“面前道道关卡，口口陷阱！”

行得春风，方有夏雨。编纂过程中，若光用一个“苦”字来形容，未免片面。大词典编纂人员说：“此中有真趣”、“苦中也有乐！”特别是经历长时间的求索后，纠正了一条旧词书多

少年来因袭的错误，或者对现有词书取得某项突破时，编纂人员的快慰之情，不亚于阿基米德发现水的浮力定律、赫歇尔兄妹发现天王星那般！

“千人糕”启示

《汉语大词典》有着博大精深之誉，具体表现于编纂队伍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大词典由全国知名学者吕叔湘、王力、叶圣陶、朱德熙、陈原、陆宗达、张世禄、张政烺、周有光、周祖谟、姜亮夫、倪海曙、俞敏、徐震诤14人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由72位汉语学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还有五省一市几十所大专院校的语言学工作者作为主要编纂人员，荟萃这么多一流人才编纂一部词典，为中国辞书史上创举。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部词典正似“千人糕”，千锤百炼，千糅万合，出于众手，如出一手，融进了多少人的心血汗水。

为喝一杯水，乃挑一桶水；挑上一桶水，须钻一口井。当初，编纂人员从1万多种图书及各类报刊杂志，收词制卡800多万张，进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精选了200多万张卡片作第一手资料，其功夫之深，资料之实，为任何一部汉语词典所未见。

这方面，社会各界给予广泛支持，社会名人曹禺、郭绍虞、巴金、艾芜、沙汀、周而复、欧阳山、秦牧等，都为大词典花过心血，解答了各种疑难问题。社会上还有许多热心人，对编纂处提出中肯意见，备加关注，如上海市铁路局有位语文教师，常定期写信来商榷；苏北某县文化馆同志也就具体词目作探讨。编纂人员也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挂上黑板，集体讨论，记录在案。

江苏省教育出版社的胡慧斌、周方，进大词典编纂处时才不到30岁，如今成了业务骨干。他们回想当年岁月，至今记忆犹新。

1990年12月，薛正兴在复审稿子中，发现有些部分释义不当，引书错误，这位分卷主编不怕家丑外扬，立即赶赴苏州编写组，邀请有关人员召开现场会议。别看老薛平时待人和气，有着书生脾性，在业务上，他可毫不含糊，“克”人厉害，弄得有人下不了台，委屈得要哭，并争辩道：“我们改对了不说，错了一个就讲那么多！”薛正兴随即回答：“改对是应该的，改错就是态度问题，反映了一个人责任性强不强的问题！”

谈到这些，胡慧斌、周方认为，这是求严的表现，“学术民主”、“严谨治学”，有时是要得罪人的，但不形成风气，不精益求精，大词典的风格特色怎能出来？

正是这样“千人糕”般的糅合凝练，大词典质量上乘，价值甚高，促进了我国汉语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编写汉语词书的专门人才，如胡慧斌、周方他们，后来都独当一面编纂了《汉语义林词典》、《汉语方言词典》和《偶句成语词典》等。可见，编大词典是“出书、出人、出经验”，如此受益当不限于一部大词典本身的收获。

不管如何，人们坚信“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在我们这个民族尚未真正富裕、强盛的时候，编纂《汉语大词典》过程中那种伟大的自我牺牲和敬业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努力奋斗。

著名外国文学语言学家季羨林说：“‘国学’——一国固有的学术，它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要照到国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巨作——《汉语大词典》，也将超越时空，如同雄伟壮丽的长城，博得世界的青睐！

1994年5月